



Multicultural
Model and Cultural
Tensions:

多元文化模式 与文化张力

西方社会的创造性源泉

张旅平 著

The Creative Sources of the West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Multicultural
Model / and Cultural
Tensions:
The Creative Sources of the West

多元文化模式 与文化张力

西方社会的创造性源泉



张旅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文化模式与文化张力：西方社会的创造性源泉/张旅平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097-5771-0

I. ①多… II. ①张… III. ①西方文化-研究 IV. ①G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4275 号



著 者 / 张旅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任晓霞 谢蕊芬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刘玉清 白秀红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38.75

版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 / 614 千字

印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771-0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导论 文化模式及其变化过程与趋势	1
一 文化模式及其意义	1
二 文化模式的重建与社会变迁	9

第一部分 西方文明的文化源泉和基础

第一章 “恶根性”文化的起源	43
一 苏美尔：最早的神庙-城邦文化	47
二 巴比伦：罪感文化之源	54
三 波斯：末世论与轴心时代文化的来临	59

第二章 作为轴心时代文明和“恶根性”文化的 古犹太宗教文化	74
一 希伯来文明与启示宗教文化的兴起	74
二 希伯来宗教文化的基本特征	81
三 犹太宗教文化的社会学意义	94

第三章 作为轴心时代文明的希腊理性主义文化	102
一 希腊理性主义的社会起源	104

二	希腊理性主义文化	130
三	希腊的两种理性文化与秩序模式：雅典民主与 “斯巴达幻象”	149
第四章	基督教文化的兴起：价值重估的一种形式	178
一	基督教的产生及其原因	180
二	基督教的崛起	196
结 语	220
一	宗教与社会	220
二	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古典文化	227

第二部分 文化模式的转变（价值重估）与 西方现代社会的重建

第五章	拉丁基督教母体与社会权力的二元结构	233
一	拉丁“基督教母体”与社会多元性	237
二	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二元权力结构与张力	244
第六章	“封建自由”秩序与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	266
一	西方封建秩序与自由	267
二	自由市镇文化的兴起及其社会张力和结果	282
第七章	个体与社会：西方中世纪后期人类组合中的 张力与变化	293
一	共同体与社会	294
二	“共同体吞没个体”	300
三	“个体的发现”与现代社会中的张力	308
第八章	西方文明中的文化张力	324
一	西方文明中第一个矛盾着的文化向度：古典希腊 文化的特点及其张力	324

二	西方文明中第二个矛盾着的向度：基督教文化因素及其内在张力	347
三	社会文化中的超越性与新取向	367
第九章	文化张力与西方社会文化的创新发展	372
一	西方中世纪文化建构中的合与分的转化	372
二	真理及其知识系统的构成和波动	379
三	文化张力与西方文明的创新发展	400
第十章	良知自由与创造性	451
一	良知的建构及其文化源泉	452
二	宗教改革与良知自由	463
三	良知自由与现代文化 - 社会的创新发展	474
第十一章	恶根性文化与法治	485
一	西方法治思想源泉（上）：古希腊	486
二	西方法治思想源泉（下）：古罗马	502
三	信仰与现代法治的兴起	528
结语	西方文明发展的悖论	547
参考文献	567
索引	598

导 论

文化模式及其变化过程与趋势

一 文化模式及其意义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透露出这样一种观念：人们要想真正理解西方，就应当首先从了解轴心时代的东方开始，因为西方的文化连续性首先是从东方开始的，西方人把本来是东方传统的一部分变成了自己的传统^①。当然，这个东方不是遥远的中国和印度，而是它的近邻，即西亚—近东的巴比伦、波斯和希伯来（犹太）文明。正是这些文明孕育和创生了基督教，而基督教又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相冲突和融合，最终注入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日耳曼民族的身躯之中，共同创造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因此，不难看出，西方文明或文化是一个由多元文化因子构成的文明或文化模式。而且，诚如哈罗德·J. 伯尔曼（Harold J. Berman）所言，“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文化因子从一开始就是对立和“不相容的”，它们在漫长的碰撞和互动过程中充满了冲突和内在张力^②。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充满张力和矛盾的文化从11世纪后期开始竟然奇迹般地融合在一起，甚至一度达到古希

① 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64、65、79页（“Jaspers”，学术界现在习惯上译为“雅斯贝尔斯”，故笔者在文中都采用此译法）。

② 哈罗德·J.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第4页。

腊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意义的和谐——“和谐是对立物之间张力的结果”。这种既多元和谐又充满张力的文化模式，在前现代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西方社会的创造性和自主性的现代化就源于此（文化多元性与张力）。这应当是社会理论最值得探讨的方面之一：近代以来，为什么西方文化和社会曾经会有如此巨大的创造性？

本来，20世纪上半叶从马克斯·韦伯学术活跃的年代开始，以文化模式的视角研究人类社会和历史，是一个日渐兴盛的事情，著名的“轴心时代”（Achsenzeit；axial age）的观念和思想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萌发的，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政治转向（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掩盖了文化或文明的博弈），“文化研究”一度被冷落。在许多人眼里，除了上述这种斗争之外，他们看不到潜隐的真正起作用的其他冲突和矛盾。不过，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标志）的到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文化差异和“文明冲突”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较之以往更加凸显出来，学术研究工作也随之发生明显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于是，“文化史”或“文化研究”这一“被瞧不起的灰姑娘”在西方学术界“被重新发现”和“兴起”^①。人们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对深藏于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或重大事变背后起作用的文化因素（信念、价值取向、习俗等）或根基进行深入探讨。以往学者们更多的是主张不变的理性选择理论，然而现在他们则把更多的目光和兴趣转向文化模式。通过对特定群体在特定时代和地点具有的文化价值取向的研究，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从有关人们行为和社会运行的经济解释（或政治解释）转向对它们的文化解释。因为在文化理论学者看来，经济活动方式，尤其是政治行动方式不过是某种“符号性的行为”或象征性行为，经济或政治问题相对而言则是潜隐在它们下面的文化碰撞或冲突的外部表现，许多问题看似是经济问题或政治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学意义的文化问题。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文化模式对经济、政治与社会的重要意义。

应当说，文化模式或者说社会学意义的文化模式的重要性，是随着以

^① 参阅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2、35页。

往政治意识形态的“终结”和乌托邦的“解构”而凸显出来的。这种本来如此的现象只有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回归常态，由某种“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并使世界笼罩上种种浪漫色彩的纱幕“烟消云散”之后，才能够被捕捉到和得以客观正确认识。上述言论本是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形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认识转变的话语^①，但现在看来用于描述当今世界，尤其是“后现代转向”（the postmodern turn）的世界，似乎更为适用。在当代，各个文明体中不管是经济运行还是政治活动方式之所以存在较大差异，除了其本身的因素外，就在于它们都受各自文化模式，尤其是作为其核心要素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制约。这种制约使得“理性选择”发生了顺从文化的变异（理性被带有文化的特殊性）。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是“嵌入”（embedded）社会网络中的^②（实际上政治行为亦同），然而，如果我们深究的话，就会发现，社会的建构和社会网络的运行又是为文化模式的取向所引导的。在现实中，市场的运行或政治活动不仅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的，而且是嵌入在某种文化化（culturalization）的社会结构中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或政治活动固然有其社会条件，但更有其文化根基，受文化价值取向和习俗深刻影响。马克斯·韦伯有关现代性为何只在西方自主产生的讨论，或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论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③ 费孝通先生道出的这一中西方差别既是社会性的，也是文化性的，而且归根结底是文化性的。同样，在经济上，现代西方多强调其法治下的自由市场成分，而东方（如东北亚国家）则更喜好行政干预和控制（尽管其程度不同）；现代社会重商，而传统社会重德；古代西亚—近东社会以宗教文本为取向，而古希腊—罗马社会则强调哲理和法理取向；传统中国重礼俗，而现代中国则事实上突出理性知识和功利主义，等等，

①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139页。

② Mark Granovetter,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A Theory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 pp. 481 - 510,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第25页。

所有这些都不是社会因素能够充分说明的。而要想对它们做进一步的深入解释，就必须加上文化的理解和说明，即韦伯强调的“价值分析”，或探讨社会现象的“文化意义”^①。不同的文化模式取向造成了人与社会的活动方向和方式的差别。因此，正如韦伯所说：“不是理念，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利益直接控制着人的行为。然而，由‘理念’创造出的‘世界形象’（*Weltbildes*, world images）常常像扳道工那样，决定了行为沿着哪条轨道被利益推动向前。”^②

因此，社会学在对人的研究上不仅重视社会关系和互动，而且也强调文化因素。不过，社会学意义的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范畴，要想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把握其实质，就必须采取一种“模式”的观察方式。那么，何谓文化模式？我们知道，任何文明的文化都是由某些文化特质和“文化丛”（*culture complex*）有机结合而成的一个富有特色的体系。这尽管涉及精神、规范（制度）和物质器用诸多方面，但其中重点当然是信仰、价值观、道德、规范、象征符号、习俗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前两项）。文化模式就是指这些文化因子的稳定化和定型化。通过这些定型化的文化因子或整个文化模式，人们易于识别某种文化的主要特征及其与他者的根本区别，从而能够更深入地分析、理解和研究不同社会运行的文化意义特点和差异，以及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传承（共同点）与区别。因此，以文化模式观察和分析人与社会，是社会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文化模式是自然（自发）形成的，但同时也是人为建构的，它是两者共同作用的产物，即一种从自发到自觉的建构过程。不过，自生的自发性是首要的，它是文化演化中创造性的源泉^③。这决定了文化模式具有多元或多样性。因为人类生存的条件、环境和禀赋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的人

①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76、21页。

② Max Weber, 1946,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s", H. H. Gerth & C. W. Mills ed. & tran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p. 2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韦伯使用的“*Weltbildes*”一词，英文译为 world images（世界形象）或 world picture（世界图像），但德语中该词本身还有“世界观”的含义，这一含义似乎更贴切一些。]

③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群对“存在”的理解与考究也不一样。在现代世界，随着接触和交往的增多和眼界的开阔，人们越来越懂得以多种文化视角看待社会现象，并认识到只有以此种方式分析和研究问题才能使其获得较为完整的理解。可以说，任何文化都是人类在适应环境中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结果，因此每一种文化模式，不论是何种民族的，也不论是超越性的（或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是当时人们在既有条件下对他们所遇到问题的合理响应（回应），都是人类不同存在方式的恰当体现，即使是宗教文化也是如此。涂尔干就曾说：“宗教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生活下去。”^①弗洛伊德也认为，若没有宗教信仰和种种禁忌，人类可能早就绝灭了。因为这种与人类社会结成一体的宗教文化给人以统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驯制人的炽情，把非理性力量引入对共同体或社会有益的管道，最终使世界成为人可以在其中生活的差强人意的世界^②。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似乎只有模式或价值取向的差别，不存在“先进”与“落后”或“低级”与“高级”之分。工业社会的文化模式对非洲某些土著部落或爱斯基摩人不一定适用，西方现代文化模式的许多内容对于非西方而言，也是有问题的。文化模式的最重要方面，就在于它的适用性与效用，但首先是适用性，后者以前者为准绳。离开了适用性，文化模式不管其被认为多么优良，也都失去意义，而且也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其涉及价值，而这又是带有强烈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对于“理念价值”（ideal values）和“规范价值”（normative values）尤其如此（例如，基督教是一种客观实在，对于基督徒而言，它们当然具有很高的价值，然而对于无神论者或其他信仰者来说，则意义不大或者没有什么价值。可见，价值尤其是文化价值，因人或文化而异，具有多样性和特殊性^③）。每一个文化模式的载体，都可能认为自己的文化模式是最好和最合理的，这尽管折射出其多少带有某种我族中心论或我族文化中心主义色彩，但却是真实的适应性和情感性反映。因此，一般而言，超越文化模式（或价值

①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550页。

② Freud, Sigmund, 1957, *Future of an Illusion*, W. D. Robson-Scott, trans., p. 54,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③ 关于这一点，参见张旅平《马克思·韦伯：基于社会动力学的思考》相关部分，《社会》2013年第5期。

取向)认识世界或他者是困难的,在封闭的状态下尤其如此。

文化模式的形成,或者说文化从其产生到定型化,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特殊的圣者和社会的中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一种文化能否定型化,形成模式,除了自然演化外,最终离不开圣者、先知或使徒的威信和社会权力中心的权威决定作用(建构中的主导作用)。例如,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基督教,从一个源于犹太教内部分化出来的、形成于北加利利一带的名为拿撒勒派(Nazarenes)的新的小教派,发展到后来的定型化和形成庞大的基督教文化模式,是与耶稣、希腊化的犹太文士扫罗(即《新约》中的使徒保罗)等重要人物的努力以及罗马社会的中心(国家权力中心和中心教会)的作用分不开的。同理,中国儒家文化的许多要素起码在殷商时期,尤其是周代就存在了,作为有亡殷背景并认同周礼的先哲或“圣人”,孔子创造性地将它们综合化和经典化,并且最终是通过社会或国家中心的作用使其定型化和形成基本稳定的文化模式的——一种典型的从轴心时代的自发涌现到“后轴心时代”的自觉建构过程。

作为一个系统,文化模式有其内在结构,这也就是文化模式的分层^①。其中,信仰、理念和价值观是最为稳定和核心的内容,也是文化模式中的最高层次,它们是国民性格、民族精神、文化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在社会“大传统”中具有统领地位和导向性。因此,它们是支配性要素,统摄真、善、美的各个领域,是思维的基本方式和行为的根本准则,主导着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建构,并与之一起控制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社会文化的其他部分都是围绕这个核心来建构和展开的。离开了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意义,社会的整合会大打折扣,社会组织的建构难以合法化,当然我们也无法理解社会行动和社会秩序的建构意义。例如,崇尚自由,视人的权利和尊严为最高价值的社会(“争的是权利”的社会),必然建立法治下的民主共和的规范和秩序,而不可能采用具有浓厚先赋性色彩的封建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文化模式。反之亦然。历史上多次出现因信仰、理念和价值观改变而使原来的文化模式衰落和社会发生变迁的现象。信仰、理念和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讲属于形而上范畴,合理性在自身,不假

^① 参见苏国勋《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98~201页。

外求，无法也无须诉诸经验验证。

在信仰、理念和价值观这一最高层次之下的是规范或制度（包括成文或不成文法和制度）。它们是文化模式的中介层面。这一层面既受信仰、理念和价值观（核心部分）的强烈影响和限定^①，又对文化的实用方面提供指导。因此它们具有形而上与经验两重性，也就是具有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两重性。文化模式的底层是文化的实用或器用方面。这是文化系统中最灵活、最不稳定、最易于变化的层面，即工具合理性层面。由于其相对远离核心理念和价值，文化乃至社会的变迁往往从这里开始。历史上由生产工具或技术变革推动的文化模式和社会秩序的变迁均属此类。

文化的这三个层次处于良性互动状态时，文化系统内部表现为和谐或协调关系，社会系统存在高度的整合，社会生活形成有序状态；反之，文化系统内部会处于失调状态，社会则因此出现“失范”或无序，甚至剧烈动荡。因此，高效的文化模式是一个整合的系统，用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的话说就是一个“整体主义”的系统。这种整合性表现在：居主导地位的“文化意识”或文化核心价值在文化系统的多数层面（甚至各个层面）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或体现，在文化的信仰、价值、道德、规范、象征、习俗、审美、生活方式等方面出现“意义与逻辑的一致性”。例如，就基督教文化而言，它有一套较为完备的信仰和理论体系——对超越性的神（上帝）的信仰、宗教世界观和价值观、经典、末世论、“原罪”观念、恩典和救赎论等；与这些信仰和理论相适应的总体伦理道德要求，如侍奉上帝、仁慈、平等、博爱（圣爱）、济贫以及勿凶杀、奸淫、偷盗、重利轻义等；相关和适用的教会规范和制度（教会法、教阶体制、修道制度、裁判和审判制度、仪式等）。除此之外，它还包括圣人圣事、卡里斯玛事件发生地（西奈、耶路撒冷、加利利）、神圣遗迹、宗教活动场所和建筑（教堂、修道院、圣坛）以及各种宗教器物，如十字架等。所有这些宗教文化因素又渗透进学术（如经院哲学）、文学、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历法以及日常生活和生产中。这

① Harold J. Berman, 1993/2000, *Faith and Order*, Ch. 3: “The Religious Foundations of Western Law”,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些显然具有意义、价值和逻辑的统一性和整合性。类似的，儒家文化（或“儒教”^①）也是层次连贯和整体主义的。其核心（或最高层）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之序的人伦思想和仁、义、忠、孝等道德规范，然后是汉代“独尊儒术”后逐渐形成的，与核心价值相应的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礼俗性质的法律（“礼刑相为表里”^②）或“儒家化”的法律规范^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或主导性的文化意识，儒家文化或儒教，尤其是南宋后随着程朱理学对儒学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强化，以及在官方（社会中心）“教化”政策的推动下，通过官方和民间上下多种管道（科举制度、民间艺文、启蒙读物以及各种相应活动）逐渐浸润了士、农、工、商各个社会阶层以及群体和家庭，渗透到文化结构诸方面——理念、认知、制度、审美、器物、风俗和生活方式，形成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独特的儒家文化模式^④，其中凸显整个文化系统的意义、价值和逻辑的一致性与整合性。

有效整合的文化模式对社会的整合具有根本的意义。索罗金说，一个现实的社会群体是否成为整合的社会系统，“这主要取决于它是否与核心的意义——价值——范围相互一致，这是因为或为了它们，人们才相互作用。这就意味着，在其它事物中，每个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现实的社会群体包含着—套文化的意义——价值——规范作为它的‘核心和灵魂’，作为它们主要的统一纽带和它存在的原因本身，这个群体正是围绕它们才建立起来的。因此，在任何现实的群体中，……它存在的‘社会’形式总

-
- ① 就“天”、祖先和孔子都有被当作崇拜的“神圣对象”之性质以及祭天、祭祖、祭孔显现出宗教性表征而言，从功能上看，儒家文化系统堪称儒教。就此冯友兰曾言，由于“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因此“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生活渗透了儒家思想，儒家俨然成为一种宗教”（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第3页）。这与钱穆“中国之礼，即中国之宗教”的说法相似（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1，第11页）。当然，儒家文化实为伦理道德体系，而非基督教那种信仰性宗教。两者情感本质不同。
- ② 《后汉书·陈宠传》（卷七十六）言：“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 ③ 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载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第328页。
- ④ 参见崔大华《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

是与它的‘文化的’意义——价值——规范不可分割的”^①。在现代，尽管“社会整合”在相当程度上已多为“系统整合”所取代（只是部分取代），但索罗金的观点应当说依然基本有效。每一文明的社会系统都存在构成文化创造力的各个领域的“文化主题”，即居主导地位的文化意识，如果一个社会达到高度整合的程度，那么在组成这个系统的各种成分中就会出现“逻辑和意义上的一致”，这种一致性反映居主导地位的文化意识^②。帕森斯在论社会系统的整合时也有类似的观点^③（当然，这种一致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社会行为总是与文化价值取向完全相符合，不一致的地方和时间或多或少存在。然而，社会的整合、人们行动的秩序要想持续，就必须至少保证最低限度的一致）。

二 文化模式的重建与社会变迁

迄今为止，大体而言，人类文明史上有过两次大的文化重建和社会变迁过程（颠覆性的重建和变迁过程）：一次发生在遥远的轴心时代^④；另一次则出现在始于中世纪末期，目前仍在深入展开的“现代性”时代。两者既有明显的本质区别，又有潜隐的文化遗产关系。我们先论述前者。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看法，人类文明社会的文化模式的第一次重建与转型，发生在遥远的一个具有广泛性的轴心时代（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理论谈及的概念或范畴难有普适性，但有广泛性）。所谓轴心时代是指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尤其是指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间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阶段。这个时代是世界主要文明历史的“转折期”和文化的“断裂”时期，或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所说的“动荡时代”

① Pitirim A. Sorokin, 1966,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oday*, pp. 27 - 28, New York: Harper & Row.

② 参阅 Pitirim A. Sorokin, 1937,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Volume One: Part one,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③ 参阅 Talcott Parsons, 1951,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T. Parsons 1937/1968,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④ Karl Jaspers, 1953,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Ch. 1,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见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7~15页。）

(the Time of Troubles)^①。在这个时代，世界主要文明的文化逐渐发生质的变化或飞跃，亦即沃格林（Eric Voegelin）所说的“存在中的跳跃”（leap of being）^②。这种文化演进中的飞跃或“跳跃”的突出表现，就是它们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与原始“宇宙论神话”的“决裂”或“断裂”（即脱离宇宙论神话的文化模式）。不论雅斯贝尔斯、沃格林抑或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都认为，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其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早期宇宙论神话的浑然一体性（compactness）”^③，建构了与神话模式不同的文化符号和社会秩序 [需要指出，尽管“轴心时代”概念是由雅斯贝尔斯于1949年提出的，此后，沃格林^④、艾森斯塔德等人^⑤对此又有深入探讨。但不容置疑，如罗伯特·N. 贝拉所言^⑥，包括雅斯贝尔斯在内的许多后起之秀在这方面都受到韦伯的深刻影响。当然，雅斯贝尔斯也承认韦伯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文化-历史哲学也是其这一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马克斯·韦伯虽然没有创造出“轴心时代”这一术语，但提到“先知时代”（prophetic age）^⑦，而且最重要的是其视野、

① Arnold J. Toynbee, 1947,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2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 Eric Voegelin, 2001, *Israel and Revelation (Order and History, Vol. I)*, p. 48, Columbia,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Eric Voegelin, 2001, *The World of the Polis (Order and History, Vol. II)*, p. 66, Columbia,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存在中的跳跃’一词并非沃格林所创，但被赋予了新的广度。该词取自祁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又译索伦·克尔凯郭尔），但该表达也要感谢黑格尔”（见埃利斯·桑多兹《沃格林革命》，徐志跃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131页注释3）。

③ Eric Voegelin, 2001, *The World of the Polis (Order and History, Vol. II)*, p. 66, Columbia,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④ 尽管直到《秩序与历史》第二卷《城邦的世界》，沃格林才提及雅斯贝尔斯及其概念，但从内容上看，前者肯定受到后者的启发 [参见 Eric Voegelin, 2001, *The World of the Polis (Order and History, Vol. II)*, pp. 89 - 90, Columbia,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⑤ S. N. Eisenstadt, 1986, *The Origins and Diversity of Axial-Age Civiliz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J. P. Arnason, S. N. Eisenstadt and B. Witrock, eds., 2005, *Axial Age Civilization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⑥ Robert N. Bellah, 2011,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 p. 27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⑦ Max Weber, 1978 [1921 - 1922], *Economy and Societ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 pp. 441 - 442, 44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文版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497 - 503页。)

思路和研究范围已经充分涵盖了这方面的内容，为后人深化相关学说开辟了道路]。

当然，伟大创造的发生是与当时群星灿烂的一批杰出人物或创始者——先知、圣人、贤哲或智者的涌现分不开的。他们是：中国春秋时期的老子、孔子（前 551 ~ 前 479）；印度文明中的《奥义书》作者（前 800 ~ 前 400）、尼干陀·若提子（大雄·耆那，前 599 ~ 前 527）、乔达摩·悉达多（乔达摩·佛陀或释迦牟尼，前 563 ~ 前 483）；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出生于公元前 7 世纪）；希伯来主要经典（律法书和先知书）的作者或“先知运动”的大先知（前 800 ~ 前 600）和巴比伦犹太学士（公元前 6 世纪），以及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前 580 ~ 前 500）、苏格拉底（前 469 ~ 前 399）、柏拉图（前 427 ~ 前 347）和亚里士多德（前 384 ~ 前 322）。这些富有创造性的伟人的思想和教导（有的是原创，有的是综合后再创造），绚丽多彩，光芒四射，构成各自文明的文化核心内容和价值取向，使各文化趋于重新定型化和模式化，并逐渐形成各种文化的“大传统”（在社会中长期居主导地位，享有最高文化权力，在正规教育系统中得到传授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使各个主要文明得以存在和延续的传统），起到轴心的作用，具有历史进程中“扳道工”的功能（韦伯语）。这也是人类主要文明或文化第一次大的转型和重建过程。以此为界，人类文明史在前现代大致可分为前轴心时期、轴心时代和后轴心时期三个阶段。

历史证明，雅斯贝尔斯的发现和解读是有充分依据的。我们知道，在前轴心时期，“神和人、世界和社会构成一个原初的存在共同体”^①。其文化的符号表达，就是各种各样的宇宙论神话。这是人类社会创造出的第一种系统的文化符号形式。它们既是人们对“存在”认识、理解和把握的方式，也是他们参与自然和社会活动的秩序形式。这表明，在当时的人们那里，圣界与俗界之事浑然一体，没有明显的划分，“神灵”或者说“神圣”比后来任何时期都表现出是“意识结构中的一个元素”^②，它们似乎

① Eric Voegelin, 2001, *Israel and Revelation (Order and History, Vol. I)*, p. 38, Columbia,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② 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晏可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第 3 页。